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8)03-0070-07

“双一流”战略引领下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探析

程伟华^a, 张海滨^b, 董维春^b

(南京农业大学 a. 国际教育学院; b. 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摘要:“双一流”战略要求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提质增效”,以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研究生教育。在“双一流”战略引领下,通过客观审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理性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应然选择完善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化管理制度,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成长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等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对助推“双一流”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双一流”战略;留学研究生;提质增效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2015年,国家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将“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作为五项改革任务之一。

众所周知,世界一流大学在服务本国、面向世界方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麻省理工学院提出“把服务于国家作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但要认识到这需要全球性的参与、合作与竞争”;剑桥大学校长莱谢克·博里塞维奇(Leszek Borysiewicz)爵士提出“最好的大学也是最为国际化的学府,此等学府应不仅具备胸怀天下之志,也应具备‘让世界更加美好’的实力”。这些大学正是把自己的使命摆到国际化的高度上来定位,才能获得全球一流的生源、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才能产出人类社会共同的知识、杰出人才和科技成果^[1]。

在“双一流”战略引领下,中国大学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如何高效积极作为,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回应。

一、客观审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一) 总体规模快速增长,研究生增幅较大

2005—2015年间,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和研究生数量分别以年均增长率11.0%、15.3%和22.6%的速度快速增长,规模发展从2005年的14.1万人、4.5万人、0.7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9.8万人、18.5万人、5.4万人,增长了1.8倍、3.1倍和6.5倍(见图1),凸显出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增幅较大。

(二) 洲际区域规模差异明显,亚洲的周边地缘优势显著

2005—2015年,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研究生之比分别以年均增长率63.5%、16.9%、10.8%、7.7%和1.1%的速度呈逐年递增态势。相比而言,非洲占

收稿日期: 2018-09-05

作者简介:程伟华(1966—),女,安徽黄山人,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张海滨(1988—),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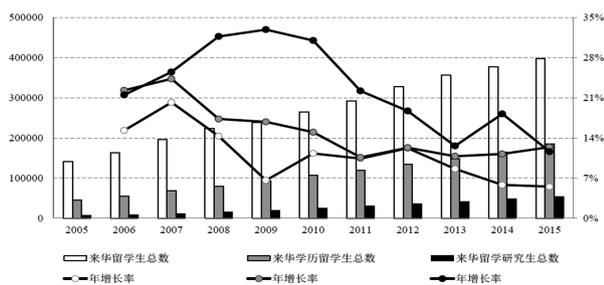
董维春(1964—),男,江苏泰州人,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双一流”战略背景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提质增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JGLX17_022);2017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立项课题《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位管理与培养特色研究—基于江苏高校的调研》(yjsjg1701),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比增幅较大;其次是欧洲,2005—2014年呈稳步增长,2015年有小幅下滑;大洋洲虽处于稳步发展,但占比极低;再次是美洲自2010年开始呈小幅下降趋势。尽管亚洲增幅一直处于小幅下降趋势,但总体占比稳定且高于六成以上(见图2)。凸显亚洲周边、地缘优势显著,不平衡现象明显。

(三) 学科专业分布逐步趋向合理,工科、管理和经济三大学科占比较高

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习的专业打破了以传统的文学、中医、汉语等特色专业为主的格局,学科分布更趋合理。与2005年相比,2015年更多研究生来华学习汉语言以外专业,其中工科(11426人)、管理(10749人)、经济(5953人)、汉语言(3995人)、理科(3098人)、教育(1506人)、农科(1471人)的研究生数占研究生总数之比均呈增长态势,占比增长最快的学科为管理和工科,分别增长了11.3和5.6个百分点,就读人数占比较高的学科专业依次为工科



注:若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源于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写的2005—2015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图1 2005—2015年来华留学生、学历留学生、留学研究生发展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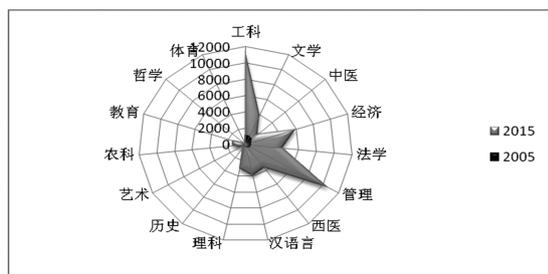


图3 2005和2015年学科专业分布发展趋势

二、理性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双一流”战略引领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呈快速发展趋势,但在规模结构、区域国别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和经费来源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 来华留学研究生总量偏低

(21.3%)、管理(20.1%)和经济(11.1%),合计占52.5%(见图3),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学科专业分布相对集中。

(四) 经费渠道以奖学金资助为主,自费生发展有待拓展

2005至2015年期间,奖学金主要资助学历留学生和留学研究生,奖学金学历留学生占奖学金生总数之比年均达77.9%;奖学金留学研究生占奖学金学历留学生总数之比年均达62.7%,且呈逐年增长态势。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发展主要依靠奖学金带动,如奖学金留学研究生占留学研究生总数之比逐年快速递增,2015年达到了51.5%(见图4),这说明中国政府奖学金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引领来华留学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效应已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留学研究生自费生发展空间有待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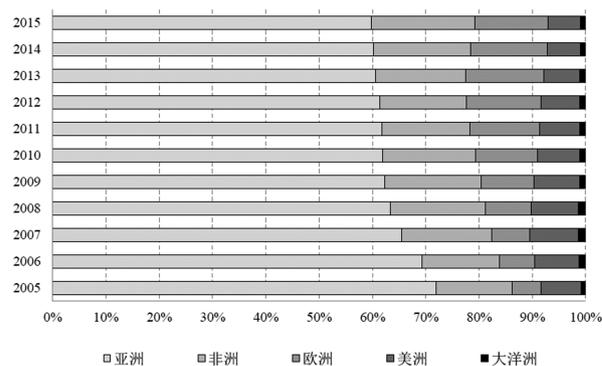


图2 2005—2015年洲际来华留学研究生发展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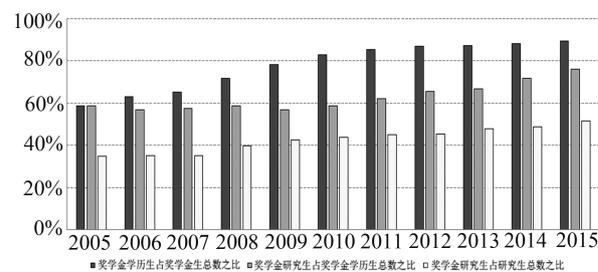


图4 2005—2015年奖学金学历留学生和研究生的变化趋势

国内外比较看,我国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来华留学本科生(131227人)和研究生(53572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397635人)之比分别为33%和13.5%,占学历留学生总数(184799人)之比分别为71.0%和29.0%(见图1),可见我国的来华留学教育依然是以非学历教育为主,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占比偏低。

国际上通行将国际学生占比(国际化率)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目

前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国际化程度普遍都比较高,研究生中的国际生普遍占比均超过了20%。但从统计数据看,2013—2015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数量均超过1000名的中国高校只有四所,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其硕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率超过8%的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接近8%;博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率均低于5%;研究生总数国际化率超过7%的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2]。可见我国大学在提升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15年我国成为世界八大留学目的国之一。《2015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5)显示,在八大留学目的国中,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占其高校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为17.97%,美国的该比例达到3.87%,而中国的该比例只占0.46%,其中,高层次的国际硕士和博士,澳大利亚占比分别为40%和34%,美国的该比例为9%和35%,中国的该比例只占2.3%和3.9%(见表1),我国在八大留学目的国中,不同层次国际学生尤其是高层次研究生占本国同层次在校生的比例都处于最低值^[3]。

表1 八大留学目的国不同层次国际学生占本国同层次在校生的比例(%)

国家	所有类别国际学生	短期高等教育课程(职业学校)	本科及同等学历	硕士及同等学历	博士及同等学历
澳大利亚	17.97	13.3	13.1	40	34
英国	17.46	5.5	13.7	37	42
法国	9.78	4.4	7.3	13	40
加拿大	8.98	9.0	8.1	14	27
德国	7.07	0.0	4.4	12	7
美国	3.87	2.0	3.5	9	35
日本	3.52	3.4	2.5	8	19
中国	0.46	0.36		2.3	3.9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Education on at a Glance 2016》

(二) 洲际国别来源不平衡

洲际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近十多年来,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研究生占全部留学研究生的年平均比例达63.5%,这些地区与我国历史、文化、地缘相近,加上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企业“走出去”战略、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战略,我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对亚洲地区的学生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2015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数量超过1000人的国家有13个,除了4个国家(俄罗斯、美国、加纳、法国)外,其他9个(巴基斯坦、韩国、

越南、泰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老挝)均来自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一直位居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国前列。来自非洲地区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占全部留学研究生的年平均比例为16.9%,增幅较大且稳步发展,主要依靠我国政府奖学金和智力援助非洲项目资助。来自欧洲和美洲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数量偏少,且呈小幅下降趋势。来自大洋洲的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数量极少。此外,近十年来,来自美国的留学研究生数2015年(1402人)是2005年(255人)的5.5倍(见图2),呈逐年稳步增长,稳居我国排名前六,但绝对数量仍较小,与我国大批学子赴美国攻读研究生规模形成了强烈反差。

(三) 学科专业优势特色不凸显

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优势和特色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华攻读工科、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高层次学位,但汉语言、文学(艺)、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学科专业,没有凸显出我国学科传统特色品牌的强劲吸引力,文学和中医专业占比分别为2015年的7.3%、3.4%和2005年的15.5%、12.9%,占比分别下降了8.2和9.5个百分点,同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中有一定规模的理学、农学,在来华留学研究生所选专业中没有凸显出优势(见图3)。

(四) 经费来源渠道单一

来华留学研究生主要依靠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2015年来华留学研究生中51.5%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见图4),目前我国统计口径的奖学金生指的是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系统申请录取的并有CSC登记号,不包括地方政府、校级、企业单位等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如果要计算在的话,奖学金生占比会更高,可见自费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亟待拓展。

(五)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难以满足多元化人才培养需求。高校以学术型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满足学生个体和学生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双一流”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需求来看,都凸显出培养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因此,从满足我国战略需求、学生个体需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多方面考虑,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培养评价三大要素构建适合来华留学研究生发展的多元化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三、应然选择:来华留学研究生 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2016年2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水平、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和效益”,即“提质增效”的明确要求,标志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进入到以“提质增效内涵式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

高水平的留学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特征,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4]。来华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因素^[5]。作为“教育大国”,努力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在提高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同时,实现“留学强国”目标,从规划对来华留学生来源与毕业后去向选择的影响,到完善对在华教育内容、教学质量、专业范围、教育层次的培育,创造“留学中国”品牌,提高“留学中国”效益,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

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的完善可为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保障。在来华留学生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其发展质量备受关注。政府资助来华留学项目承载着为来华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的学术性目标和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才的政治性目标的双重使命^[6]。因此,完善的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宏观层面,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人事、外交、外专、人力资源保障、公安、出入境、检验检疫、保险等相关部门应从解决来华留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制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法规政策^[7],要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和网络管理平台,协同解决来华留学生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现实问题,在切实做到来华留学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同时,为来华留学生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化的留学环境,促使国际学生在华学习生活利益、安全有保障,在教育培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体验和热爱中国文化,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成为他们终生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二)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化管理制度

规范、系统、科学的政府—高校—社会机构“三位一体”的管办评分离的质量保障体系可为科学化管理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国家宏观法规政策指导下,政府应引领高校依据办学目标和任务,以需求

为导向,卓有成效地进行制度建设,主动、积极进行教育国际化的改革创新和提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

政府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形成系列实施规划细则,如制定来华留学研究生招收高校的资质审核注册制度、来华留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和考核制度、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管理的质量监管制度、来华留学卓越人才培养实施制度、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华就业、创业制度等等,以制度激励和引导高校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规划之中,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激发高校教育对外开放交流“提质增效”内生动力源泉,助力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进入和赶超世界一流。

高校层面,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确立与高校办学定位相一致的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建立以培养质量与特色为主导、适应国际学生教育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深化综合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目前多数高校的留学生事务的两种主要管理模式“内部职能型管理模式”和“事业部型综合学院管理模式”^[8],已形成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特殊化”和“边缘化”共存现象,在以“提质增效”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已凸显出管理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应采取有力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与中国学生“趋同化”管理进程,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社会民间非营利机构层面,政府授权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评估,建立健全外部质量考核评估监管机制,形成规范、系统、科学的管办评分离质量保障体系,以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成立的下设非营利性机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已经承担着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监管职能的第三方机构。根据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启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的要求,于2016年1月起正式启动首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试点院校的评估工作^[9],截止2017年,完成两期62所院校通过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认证结果将作为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对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方向引领作用。

(三)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成才成长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

来华留学研究生成才成长培养质量是中国特色国际优秀人才培养的关键。“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

提出“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我国作为“留学大国”,为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教育、外交、管理等各领域高素质人才,对增强和发展同世界各国政治、外交、经贸的关系,开展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努力实现“留学强国”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急需建立健全以研究生成才成长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切实落实到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和管理过程之中,培养中国特色国际化优秀人才。

1.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促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持久动力^[10]。第一,建设一流的导师队伍。以研究生成才成长培养质量为核心,导师考核评价除了考虑反映研究水平的发表文章的数量、课题的层次和数量等量化指标外,更应考核评价导师的理想信念、师德师风、道德情操、仁爱之心等综合素养,同时,加大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师的培训,发挥导师对留学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提升指导能力和国际化培养水平。

第二,建设一流的教学师资队伍。教师的政治、文化素养、教学能力、师德水平直接影响培养质量,组建具有国际视野、教学能力强、师德水平高的师资队伍,是增强来华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教师能否与不同文化特点和心态的学生进行有效沟通,采用适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确保每个国际学生充分有效地享用教育资源,应纳入教育创新和改革的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建设一流的国际学生管理队伍。国际学生的“保姆式”和“制度化”管理模式,已凸显出不足。“保姆式”的溺爱管理只能惯坏孩子,不利于学生成才成长;“制度化”刚性管理,容易激化矛盾,缺乏灵活性,沟通交流困难,效果差,不利于服务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工程建设。应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实现“保姆式”和“制度化”到“管理导师制”管理模式转变,有关管理人员应将管理与服务育人相结合,为来华留学研究生在生活适应、文化理解、学习成长等全方位提供指导,成为具有创新精神、能够解决学生问题、了解学生动态、指导学生学习和引领学生成长的“管理导师”。同时还要加强来华留学教育管理者的研究工作,积极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研究,结合国家政策学习,领悟政策精神,研

究和掌握不同国别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提升来华留学服务育人治理能力和水平。

2. 建设一流专业课程体系,打造一流学科品牌

优势特色的一流学科专业是吸引更多来华留学研究生的重要条件,应以一流专业课程建设为抓手,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学科品牌。

(1) 建设一流专业课程体系

正确处理中文专业课程体系和英文专业课程体系的关系。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初期阶段,为了打开国际教育局面,创“留学中国品牌”,教学语言采用英语以吸引国际学生、参与全球的国际教育,提升国际实力和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手段。《留学中国计划》要求,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推动学校国际化专业建设。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实施的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建设工作,2013年开始启动第一期,2016年开展了第二期建设工作,全国已建设300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提前完成到2020年达到300门的计划。另外,一些省份也已启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精品课程建设,如江苏省2014年启动,截止2017年底,已建设省级英文授课精品课程245门,计划到2020年完成300门课程建设任务。

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应引导和激励有实力的高校在已有的一定数量的英文授课课程的基础上,按照同一门类相近学科进行专业课程优化组合,建成全英文授课专业项目和优质课程模块,通过建立优质教学资源网络共享平台,将这些英语授课课程与全国更多高校、更多中外学生共享,打造“英文授课课程和专业”的国际品牌,吸引更多欧美发达国家优秀生源。

更重要的是应明确英文教学只是发展过程的一种手段,不必面面俱到,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要完善中文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和项目设置围绕学校优势特色专业、通识性课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类课程,依托成熟的汉语课程展开,形成具有高校特质、采用汉语授课的“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学科品牌,培养熟知中国语言文化优势、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心的国际拔尖创新人才。

(2) 打造一流学科品牌

在全球经济发展疲软的今天,“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更受世界重视^[10]。优势特色学科品牌,能够吸引更多潜在优质生源。第一,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工科、管理、经济和法学等学科深受“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国家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研究生

生源发展潜力巨大。各高校应根据自身学科优势设立有特色有优势的高质量项目,立足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研究生从中国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学科品牌。同时,与生源国最高学府建立合作关系,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走出去”办学,并与我国“走出去”企业进行“产学研”联合培养国际学生,这样既可以改变目前以学术型为主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又能形成学术型和专业型培养相结合,中外高校联合培养、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与企业“产学研”联合培养并举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多元化培养模式,确保高质量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第二,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对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应抓住这一时机,进一步凝练传统的文学、汉语、中医等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特色文化学科品牌,吸引更多欧美发达国家的优秀国际生源,拓展洲际国别结构。

第三,我国的理学和农学等学科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发展规模逐年稳步发展,但并未凸显优势和特色,应创造条件借力打造品牌效应。如,可充分利用我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资源。截至2016年底,共有140个国家设立了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窗口,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1]。学者们研究指出,要进一步充实和提升孔子学院的办学内涵,变汉语教学与研究为更多学科专业领域的办学合作^[11]。如南京农业大学“对口援建”的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形成了“以汉语语言文化教学为基础,打造农业培训和农业人才培养特色”的办学模式,为提高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国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2]。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西安全国孔子学院工作座谈会主旨报告中所说:“孔子学院已经走出校门,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孔子学院集语言教学、文化交流、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一体,是充满活力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13]肯尼亚埃格顿大学由此也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埃格顿大学可持续农业与农业商务管理卓越中心”项目资助,南京农业大学与埃格顿大学共同实施,同时,两国大学将联合培养90名非洲农业人才^[14]。

这种借孔子学院与优势特色学科的合力,不仅可以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学科品牌,而且可以达到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获得国际组织和

外国政府的认可和项目资助,吸引潜在优质国际生源的多层效果。

3. 加强学术活动,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要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卓越人才”和“精英人才”,使其成为中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一份子。我们应组织来华留学研究生与本国学生共同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学术交流、论文研讨等活动,为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业发展创造更多交流的空间和机会,为实现一流水平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和服务“双一流”建设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任友群.“双一流”战略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16(6):15-17.
- [2] 凌德祥.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7):62-66.
- [3]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EB/OL].[2017-8-22]. http://www.sohu.com/a/132873452_560611.
- [4] 张慧君.国际化进程中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J].高等教育研究,2007(24):46-47.
- [5] 刘水云.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8):26-31.
- [6] DONG L, CHAPMAN D 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Program: an effective form of foreign assistanc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08, 54(2): 155-173.
- [7] 来华留学生该怎么“管”[EB/OL].[2017-8-30]. <http://www.xzbu.com/7/view-8124754.htm>.
- [8] 彭庆红,李慧琳.高校来华留学生事务现行管理模式分析与分层管理模式探索[J].现代大学教育,2013(1): 51-53.
- [9] 我校罗鹏副校长赴京参加第二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院校签约仪式[EB/OL].[2017-12-23]. <http://www.gmc.edu.cn/info/1046/9356.htm>.
- [10] 郑刚.新世纪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及其改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1):57-62.
- [11] 韩映雄,石梅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海外办学—以孔子学院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0(10): 40-44.
- [12] 南农大肯尼亚建首家农业特色孔子学院[EB/OL].[2017-12-23]. <http://news2.jschina.com.cn/system/2016/05/13/028661440.shtml>.
- [13] 我校肯尼亚孔子学院工作得到国务院领导首肯[EB/OL].[2017-12-23]. <http://news.njau.edu.cn/2017/1222/c65a92210/page.htm>.
- [14] 新华社.中肯两国大学将联合培养90名非洲农业人才[EB/OL].[2017-12-25]. <http://news.njau.edu.cn/2017/1211/c70a92009/page.htm>.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s in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Strategy

CHENG Weihua^a, ZHANG Haibin^b, DONG Weichun^b

(a.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double first-class strategy demands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improve bot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make the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world class. This pap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strategy, rational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rough view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ws and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other effective measure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push forward the double first-class development.

Keywords: double first-class strategy;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上接第 12 页)

参考文献:

- | | |
|---|--|
| <p>[1] 刘贵华,孟照海.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逻辑[J].教育研究,2015(1):73.</p> <p>[2] 刘晓飞.我国研究生教育战略发展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7(10):26.</p> <p>[3] 王富伟.独立学院的制度化困境——多重逻辑下的政策变迁[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2):91.</p> <p>[4] 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学的组织基础[M].张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47.</p> <p>[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p> | <p>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12.</p> <p>[6] 缙倩雯,蔡宁.制度复杂性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解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1):136.</p> <p>[7] 陈洪捷,沈文钦,高耀,等.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改革与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路径的调整[J].教育研究,2016(1):24.</p> <p>[8] 胡莹.关于我国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再思考[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2):35.</p> <p>[9] 袁本涛,王孙禺.我国实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反思与改革刍议[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72-75.</p> |
|---|--|

Preference Tendency to Accreditation Benchmark for Postgraduate Degree Authorization under Multi-institutional Logic: Based on Interviews in Twelve Universities

CAO Zhaole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2 higher-learning institutions obtained through focus-group interviews and with Nvivo8.0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eference to the accreditation benchmark for postgraduate degree authorization inclines to the awarenes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involving three kinds of institutional logic,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The tendency shows four mod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 balance point in institutional logic can be found among the tensions with the measures of 1) policy-makers clearing up which the dominant logic is; 2) higher-learning institutions giving full play to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and tak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market interaction; 3) the market effectively coordinating conflicts among interest group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nstitution to relie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with which, a scientific, reasonable accreditation benchmark for postgraduate degree authorization can be finally established.

Keywords: multi-institutional logic;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egree authorization accreditation; quality; quantity; benchmark preference